

一般意义上否定进口方的二次创新。

“301 调查”指责中国通过对外投资取得技术,指责中国在对外投资上的各种支持政策。无疑,在近年来中国的对外并购中获得成熟企业及其相关技术、品牌、国际市场网络是一个重要战略,这是中国在靠廉价劳动力辛苦了 30 多年并因此积累了大量资金外汇后的一种现实可行战略升级道路,在并购过程中也完全是公开透明遵循国际规则的。然而对于这样正常的国际商业行为美方却横加指责,更不乏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理由否决了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多起并购案,无非是因为中国因此可能实现快速技术进步。加上美国长期坚持的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充分表明美国的真正意图不在于维护贸易公平,而在于维护战略性技术优势,抑制中国的进步。

客观地讲,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无数的涉及知识产权商业活动中,有企业侵犯知识产权包括外国知识产权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在一些地方政府中也会存在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的行为和政策。但是对于这些案例只能通过法律程序来起诉当事人,而不是以贸易报复方式制裁整个国家。

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创新和人类社会进步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现行制度也存在着过度保护的现象,对于后起国家的技术进步造成了障碍。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货物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公平贸易体制对促进贸易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也有一定的发展,各国积极推动跨境交付服务提供,也在投资协议中努力促进商业存在。制造业与服务业国际投资的促进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双边与区域性投资协定大大促进了各国的市场准入。与此相比,知识产权交易的自由化程度却很低,从总体上讲,现行制度更注重保护而不是促进知识产权的国际交易。20

世纪 70 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技术的国际流动问题也得到了重视,但是在这一个问题上迄今没有达成国际协议。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用技术优势实现其市场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但国际社会却不能对其进行约束,发达国家政府则从其利益出发不积极推动技术转让自由化程度的提升,相反还把过度保护变成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使正常合理的技术转让受阻。美国深知现行状态对它的有利性,不但不像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那样推动技术转让的自由化,而且还强化过度保护,阻止在贸易投资过程中相伴随的正常合理的技术转让。“301 调查”指责中国所谓强制技术转让是现行国际经济各领域自由化程度不平衡的表现,更是美国利用这种不平衡抑制《中国制造 2025》的策略。当前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正在发生,40 年改革开放建立的基础为中国抓住这场革命的机遇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国不但在有些行业中开始追赶美国,而且在有些行业中与美国几乎同步。美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态势,因而抑制中国发展成为它的战略需要,可惜它用的是反对正常合理技术转让的理由和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手段。美国一再抱怨对华贸易逆差,但是其发动贸易战的逻辑却完全不通。美国指责中国投资环境不公平,然而这并不是构成美国逆差的原因,相反,如果美国更多地在中国投资,那么更多产品会因在中国生产并销售而不再需要从美国向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逆差还会更大。美国的决策者不会不清楚其中的关系,因此贸易报复的真正目的只能是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抑制,而不是减少贸易逆差。

明确了上述道理后我们可以说,不论由美国发起的这场贸易战是否真的开打,以什么方式结束,在美国的逻辑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中美贸易争端不会影响中国的开放国策

孙 杰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使世界经济格局可能出现明显变化的窗口时刻,与原有大国出现贸易摩擦和争端的可能性急剧上升。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和日本是这样,今天的美国与中国也出现了类

似的情形。虽然这看上去好像是一种规律,但是如果我们将它放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活动背景下去分析,依然只是关注贸易问题,特别是货物贸易问题将是非常片面的。

一、单纯的货物贸易已经远远不足以反映当前的国际经济关系

如果说20世纪20-30年代出现的国际贸易战,甚至80年代出现的美日贸易战反映了当时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矛盾和冲突的话,那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已经彻底重塑了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内容与形式以后,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服务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投资和服务贸易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不仅使得增加值贸易的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更使得各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特征更加明显。事实上,投资和服务贸易恰恰是美国对华贸易的优势所在,而考虑到增加值贸易后,中国对美的货物贸易顺差也将进一步下降。

因此,仅仅关注货物贸易差额的得失,试图用以邻为壑的贸易战方式解决问题,不仅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更违背了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潮流。以对等贸易的名义奉行强硬的单边主义,以国内法处理国际关系,或者试图野蛮地依靠彼此伤害来达到目的显然是不理智的,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会进一步激化矛盾。经济的问题只能通过经济的手段,按照符合市场的原则来解决。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追求合作共赢与互利互惠已成为一种全球共识。

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更加广泛、深入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以后,很多挑战不再是以一国之力就能应对的,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遵守国际规则、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分歧,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应该也没必要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

尽管静态地看,贸易顺差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但是所有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追求都不是一次性的,追求经济增长的能力从来都比经济增长本身更重要。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并

不是重商主义者所关注的财富或外汇储备本身,而是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财富提升自身的生产效率、研发能力以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这个意义上,适度的逆差甚至比顺差好。

从中国国际收支具体项目看,收入来源的稳定性一直是比较高的。在经常项目下的交易中,货物贸易是稳定的盈余来源,服务贸易逆差主要反映在出境旅游上。金融项目下的交易波动性相对比经常项目要大一些,这符合世界各国金融项目的波动特征,而且只要不出现趋势性的波动,金融项目的总余额还是相对稳定的。虽然中国在2015年前后一度在其他贷款项目下出现了异常流动,但是在加强合规性审查以后很快就得到了抑制。这说明即使在出现异常情况时中国的国际收支依然可以保持稳定。

更重要的是,不论是从传统的角度看,还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也是口径最宽、考虑最全的外汇储备充足性评估(ARA)标准来分析,当前我国的外汇储备水平不仅足够满足清偿需要,而且也能够满足稳定金融市场和稳定宏观经济波动的需要。因此,中国不再需要持续地追求外汇储备的增长和贸易顺差。

应该看到,当前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是市场运行的结果,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贸易优势的体现。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看,如果只是单纯地采取关税和配额等保护主义措施,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逆差国的收支状况,而常常体现为贸易转移。

三、全球化需要反思,但是大趋势不会逆转

诚然,中国经济在最近30年来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但是全球化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优配置的过程,因而给各国都带来了好处。对于美国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的优势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回报大都被金融寡头和精英所攫取,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而要普遍提高国内各阶层的福利则需要分配制度的保证。按照世界银行估计的基尼系数,美国从1979年的0.346上升到1986年的0.377,而到2013年则进一步提高到0.411,显然美国在收入分配方面成效甚微。早在10多年前,斯蒂格利茨就出版了《让全球化造福全球》(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一书,专门讨论了全球化造成的分配

问题,可惜多年来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2016年12月,IMF的《金融与发展》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重置全球化》文章。作者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当前的全球化被叠加上太多的程序和任务,不堪重负,因此主张全球化进程需要重新设置,在归零后重新开始,以便顺利运行下去。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提出一个恰当的全球化发展基准水平。作者认为此前的全球化可能是一种超调状态(overshooting),而国际投资和贸易5%左右的增长更可能是一种值得期待的适度水平,也许只有这个速度的全球化才能够留给各国足够的时间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也就是说,当前的金融全球化程度也许才是恰如其分的(getting it right)新常态。

不过重要的是,尽管过去的全球化造成了分配的不平等和发展的失衡,并最终促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但是驱动全球化的因素依然会发挥作用。毫无疑问,降低成本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动力,而贸易保护主义必然造成成本上升和国际竞争力下降。从这个逻辑上说,逆全球化要能持续,就需要避免出现这种不利的局面,而这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技术进步造成的成本下降可以抵消逆全球化造成的成本上升,从而维持产品竞争力;二是逆全球化产品的竞争性或替代性产品的生产也要同步转向逆全球化,才能使得逆全球化产品不会在竞争中丧失优势。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两个前提条件很难存在,因而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是没有出路的。

四、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

正是在美国针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摩擦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明显冲击并使刚刚向好的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的演讲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习主席的讲话指出,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势,我们认定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习主席还强调,要使这些举措尽快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努力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企业和人民,及早惠及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这样的主旨不仅向世界表明中国坚定推进开放的决心以

及维护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态度,更是对逆全球化的回应,与各种贸易保护主义高下立判。还应该看到,习主席的讲话不仅坚持了中国一贯的政策主张,更体现了中国以客观、审慎、可控自主的方式推进改革的风格,这不仅符合市场预期,甚至反映在前一天的国际资本市场走势中。

习主席讲话的内在逻辑是因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回顾中国的开放历程,从1978年开启改革,1992年的“南巡讲话”,2001年加入WTO,到2005年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尽管每一次重大的改革措施在出台时都伴随着各种担心和争论,面临着各种挑战,但是每一次重大改革举措的方向都明确坚持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了打开国门搞建设的基本理念,实现了以开放促改革,并且最终都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篇章。

根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要求和条件,这一次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既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这个重大的和具有深远影响的措施,也包括诸如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和加强产权保护这类软环境的建设,自然也包括了常常被提及,并且当前美国制造贸易摩擦直接借口的贸易顺差问题。习主席明确指出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要主动扩大进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习主席在讲话中还谈到了希望外国政府也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希望发达国家也对正常合理的高技术产品贸易停止人为设限,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等问题。这是因为开放从来都是,而且也只有是双向的、互惠的、共赢的,才能是可持续的。

总之,中美贸易争端不会影响中国的开放国策。

注释:

①该体系由商品美元还流机制、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和金融危机的美元救助机制等构成。参见李晓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的视点与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